

柯永权：

“纪录片的生命力，就在敞开的故事里”

► 学生记者 连敏华

在2025年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，台上的灯光打在柯永权的脸上。他手里攥着凭借《河湟三章》获得的奖杯，站在麦克风前，说了一段让台下许多人感到意外的发言。

“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想明年就不做纪录片了。”他握了握奖杯，声音很平，“但今天来到现场，看到了很多的师长和同行，接收到了很多新的能量，我觉得明年还是要继续在场。”

“在场”一词串联了柯永权生活的许多瞬间。从广东南部的海边小镇，到清华园的红砖绿槐，再到西北黄河岸边的荒凉旷野，这个本该在水泥与图纸间度过职业生涯的土木系学生，因为在清华遇见了影像，人生被推进了一场探寻真实世界的旅程。

转入影像的志趣

2008年夏天，柯永权拿到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。这并非他的第一志愿，他本想进入建筑系，却因三分之差与梦想擦肩而过。

“也是做了一部分的妥协吧，

柯永权



纪录片导演。200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，2013年毕业于新闻与传播学院。代表作：《大河唱》，第九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；《大学》，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/科教片入围；《河湟三章》，第十五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短纪录片；《百年守护》，第十五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入围。



我说我先去土木系试一下。”柯永权回忆道。但进入清华后，工程学科高度数据化、程序化的特性，与他个人的喜好开始产生摩擦。在土木系期间，他尝试过不同的方向，但无论怎么调整，那种无法融入的迷茫感始终挥之不去。

在寻找方向的两年里，一种新的志趣也在悄然萌生，是关于校园生活里的零星创作。那时候班级办活动、过节日，都需要做一些视频。没有任何影像基础的柯永权，全凭着本能和兴趣去摸索。他用最基础的软件把那些琐碎的校园片段拼凑在一起。在这

个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对影像有着超越寻常的耐心。

最终，柯永权还是下定决心离开土木系，转系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。在他确定离开土木系的那天，班里的同学们瞒着他，悄悄为他单独做了一个告别视频。全班同学的笑脸和祝福在屏幕上闪烁，那个平时木讷、不善言辞的南方男孩，在寝室里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泪水无法自抑。他带着土木系同学们的鼓励，在转系申请表上签下了名字。

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后，他走进了尹鸿、雷建军、梁君健等



本科毕业，清华留影

老师的课堂。这里的教学不讲空洞的宏大理论，雷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强调的是最具体的操作：镜头盖摘下来要立刻放兜里以免丢失；收三脚架时手不要放在中间，容易夹手。而最核心的一条则是——艺无定法，发心要正。清影特有的影视人类学脉络，以及“影像温暖世界”的理念，开始在这个工科转来的学生心里扎根。

扎进真实的世界

2011年暑假，柯永权迎来了人生中具有真正启蒙意义的一课——第一届“清影工作坊”。没有任何先例可循，十几个清华学生塞进了一列晃晃荡荡的绿皮火车，一路向北，直到脚下踩着北大荒一片无人知晓的湿地。

南方人柯永权被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。他所在的小组共4人，要在三个星期内，在一片叫“水城子”的巨大湿地里完

成调研与拍摄。网络上的资料一片空白，他们只能坐着车在湿地岸边盲目地找人。

就在水城子的岸边，他们机缘巧合地撞见了苗二叔。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：他承包了湿地的捕鱼权，和两个雇工住在水边一间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；在岸上，他是父亲，是丈夫。妻子远在外地照顾孙子，他独自一人留守水上，忍受着孤独。与柯永权一行人相遇时，他正在为已故好友的遗孤筹办一场婚礼。

性格内向的柯永权并不擅长交流，于是主动担任摄影师的角色。“你们多跟苗二叔交流，我来拍。”但有些场合退无可退——船舱里只能坐下一个人，他必须一边扛着摄影机，一边跟镜头前的人交谈。

“我开始跳出自己的舒适区，”他说，“慢慢学会怎么扎进真实世界里。”

三个星期里，他们跟着苗二叔清晨出船打鱼，遇上过暴风雨，也上岸拜访过他的亲朋好友。大自然最原始的暴烈与人类在天地浩渺间生存的韧性，在小小的镜头里完成了撞击。

离别时，苗二叔执意要请他们吃饭，叫来了家人和朋友。柯永权坐在热气腾腾的人群中，突然明白了解说词无法填补的深处空洞——纪录片的生命力，就在于这毫无保留的、敞开的故事里。

那门课不仅让他拿到了大学里最高的分数，也成了他创作的起点。

大河奔腾唱我心

2016年的春夏之交，已经毕业、在上海工作的柯永权，正在新安江拍摄“九姓渔民”后代树根的故事。树根也是个在入世与出世间拉扯的边缘人，住在水边小屋，唯一的娱乐是一把吉他。但按照当时媒体纪录片的快节奏要求，他们必须在几天内完成拍摄、转战下一站，为了画面好看甚至需要设计摆拍。看着树根在自己的指挥下像个牵线木偶一般配合，柯永权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虚无。

老雷（雷建军老师）的一通电话打垮了时空的隔阂。老雷在电话那头问他：“去西北扎扎实实地待两年，拍一部关于苏阳与



告别新安江的时候，柯永权（中）与树根一家留下了唯一一张合影



宁夏盐池，《大河唱》主人公刘叔就住在这里。为了拍到突降的大雪，柯永权扛着摄影机和脚架在风车下狂奔

黄河的音乐纪录片，你来吗？”

挂了电话，柯永权在手机上搜索了“苏阳”，然后开始在网易云音乐听他的两张专辑。那个下着小雨的清冷的夜晚，像极了孟浩然所写的《宿建德江》：

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

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一千多年后的夜晚，一个远离了故乡的人，站在同一条江边，从歌声里听到了乡愁。

他回复老雷：西北见。

随后他辞去了工作，打包行李回到北京，彻底成为了一名清影工作室旗下的自由纪录片工作者。

清影有自己“奢侈”的人才培养方法：在一个相对浮躁的时代，用尽全力为这些年轻的创作者阻挡外界的喧嚣，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创作时间、空间和自由。老雷允许他们花费数年时间，去西北的漫天风沙里等候一部作品的诞生。

于是，柯永权和团队在2016年北京的一场暴雨中开机，这便是后来的院线电影《大河唱》。

三年后片子完成。上映前两天，他和另一位导演杨植淳没有留在北京做宣发，而是开车去了西北。他们带着投影仪和幕布，去到四位民间艺人的家里，把片子放给他们看。

在甘肃环县的一个偏远山村，皮影艺人魏宗富的家成了方圆十几公里最热闹的地方。老魏把认识的亲朋好友、所有村民都邀约过来——“这几年一直有群年轻人在我家，村里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今天让他们看看。”天刚黑，幕布支起来，老人小孩搬着小凳子坐好，眼睛映着光。

“那一刻最接近我对电影的想象，”柯永权说，“纪录片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完成了它的创作——闭环了，也打开了。”

《大河唱》最终走出了西北，

甚至在地球对面的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上，让上百个国家的观众跟着苏阳一起狂欢、齐声高唱。

哥伦比亚的孩子们看着柯永权的东方面孔，骄傲地向他介绍卡利家乡的母亲河——考卡河。江河的魔力在这一刻跨越了语言和肤色，而在这一场宏大的跨文化交流背后，是清影多年来坚持“人文影传、学术影像、同人精神”结出的硕果。

电影上映后，柯永权没有留在聚光灯下，他以一种更加缓慢、甚至有些逆时代而行的速度，继续进行着他的纪录片创作。

这个叫《大河唱》的片子，最后的票房不到五百万。“低于预期，”柯永权说，“创作不够极致，观众不会买单的。”

他并不避讳这一点，但不愿意细说哪些地方妥协了。“他不完美，但这就是你的孩子，你不希望说他的坏话。”

真正让他感到灰心的不是票房。2023 年底，他和妻子严肃地讨论过是不是该找个单位上班。独立纪录片的环境在急转直下，“创作环境和放映渠道都在萎缩”。没有线下放映，没有观众坐在一起观看和讨论，观众也被培养成只能接受快节奏消费内容的人。

“我跟家人说，再做一两个片子，没起色就彻底告别纪录片了。”于是他又回到了西北，打算在这里拍摄最后一部作品《河湟三章》。

柯永权带着团队在青海明长城脚下的一个村子驻扎下来，这里有持续了数百年的社火传统。在秋收后的田野上，村民从各自家中取来麦秆和柴火，共同扎起巨大的火龙把。太阳下山后，火龙把被点燃，窜起十多米高的火焰。难得相聚的村民们围着火把舞龙、跳舞、唱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火焰成为整个村庄共同点燃的精神图腾。

“火光后面的一张张脸，非常具体，”柯永权说，“田野里总是会有这样的时刻，让你觉得所有的艰难都是值得的。”

走入时间的河流

《2306》是他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，从 2013 年拍到现在。还在清华读书时，他在《南方都市报》上看到一篇报道，讲北京西三

环一个高级公寓顶层隐藏着一间非法群租房，三十多户人挤在里面。2013 年除夕，他从学校坐公交车到紫竹桥，按照报道里的照片找到了那间房子。大部分人都回家过年了，他跟正在收拾行李的几个年轻人聊了聊之后，决定住进去。

他写了一封信，打印了三十多份，从门缝里塞进去：“我是住在 All 的小柯……这里像一个缩小版的北京，我想为我们这代人留下一些影像记录。”主动联系他的几个人，成了这部片子的拍摄对象。

“拍他们，其实也是在拍自己。”柯永权说。

十三年里，柯永权与拍摄对象们一起，从青年变成中年，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：Y 最早回到老家，他对小房间的怀念构成了影片的叙事动力；L 留在了北京，他的雄心伴随着不断与现实周旋的疲惫；C 的爱情、婚姻及最终的离世，是极强的现实重量和悲剧色彩；S 去了日本从此未归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，他们在期待一场重逢。

今年，这部电影终于要完成了。柯永权希望“能超出社会观察的层面，呈现时间如何改写我们这代人的命运”。

他的前两部纪录电影，有二十多万观众在影院看过。如今，他开始把新作剪成中短视频发

在自己的账号上，最多的一条有四百万人看过。“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留下就够了，”他这样看待突如其来的流量。

有人私信他说要放弃工作来北京跟他学纪录片，他都劝退了。

“我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在做片子，请不起人。再说纪录片充满了等待和遗憾，不适合所有人。”

“那为什么你愿意付出一辈子？”我们问他。“因为它很刺激，”柯永权想了一下，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不确定性对我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。”

“可刺激的事情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是纪录片？”我们又问。

“它超越了浅层的感官刺激，更接近生活的真相——不断有期待，有落空；可能会等到一个决定性瞬间，但更多时候是一无所获。”他说，“就像《2306》里 L 说的，‘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剪辑的’。”

那些刺激的在场的瞬间，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班沙尔上营村和卡跃村，发生在北漂青年的群租房里，发生在北大荒的湿地和渔船上，最终倒影在柯永权登上学院奖的领奖台的时刻，他把这个含金量极高的奖杯，送给了那些在时代急流里被冲刷的普通人。

他还会继续在场。在下次社火来临的时候，在大河奔腾不息的激流里。

【学生记者余雯涛对本文亦有贡献】